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下)

这些火一般的赠言，激励着少团员们。毕业后不久，一部分团员升入中学；有的前往解放区学习；许多团员奔赴抗日前线，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还有的在新中国诞生后，担任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

不熄的抗战之火

1938年，宁夏全省各学校在“少战团”的影响下，相继成立了抗日宣传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宁夏女子中学组织了妇女救护训练班、天足宣传队；银川郊区的金贵乡郎家巷小学学生集体加入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平罗也成立了“宁夏少战团平罗分团”；平罗一小在陆平（现名苏文）、贺闻韶和校长刘庭栋的领导下，成立了平罗少年农村服务团，编辑校刊《呼声》，发展团员150余人；石嘴山小学学生在教员叶松林、李宛、蒙新中的指导下成立了少年战地服务团。平罗县黄渠桥第二完小（北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更为活跃，在教员、地下党员杨寿亭（杨一木）、李振声（李东甫）的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大众剧社”，他们组织师生阅读进步报刊、办壁报、举办演讲会，给群众教唱抗日歌曲，演出街头剧，并且开展了抗日募捐活动。1938年“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宁夏全省各学校都组织了抗日宣传活动，全省人民的抗日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8年9月25日，日寇出动飞机20余架轰炸银川，各校停课，人员疏散。“少战团”负责人杨文海、薛云亭等人利用停课之机，召集“少战团”主要成员李志纯、李有祯、冒海天等十余人，集中在宁夏省城郊外的金贵乡小学校进行了严格训练。之



后，由地下党协助，将团员宋谦、钱锐、杜子英、饶毓葵等同志送往延安抗战大培训。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武汉后，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则积极反共。宁夏国民党当局也开始取缔包括“少战团”在内的一切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并成立了“防共”“反共”的抗敌后方服务团。宁夏省政府对中小学校教员进行登记审查，以无师范及大学毕业证书为名，前后解聘进步教师四五十名，然后从

西安等地聘来一批反动教员。他们还下令查禁进步书刊，印刷和推行《抗战与文化》《中央周刊》《民意》《扫荡报》等反动刊物，进行反共宣传，并且下令逮捕杨文海等同志。“少战团”从金贵乡训练结束回到银川的当天，敌人便派宪兵到实验小学大探杨文海是否在学校。这引起了杨文海的警惕。他同薛云亭等人商量，决定先将有关文件交李有祯转移到安全地方，然后在晚上转移。当晚，宪兵闯进学校，声称要抓“汉奸”。在教工的掩护下，杨文海从后门离开学校，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

逞。第二天，银川城内警察、宪兵纷纷出动，挨门挨户搜查杨文海，并派人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口严加盘查。杨文海经过化装，身披老羊皮袄巧妙地混出城外，于第3天夜里由进步人士杨茂林先生雇请伐木工渡过黄河，到达解放区。1939年1月，地下党员薛云亭也带领李志纯、李振声等同志也离开了宁夏回到三边。就此，“少战团”的活动因遭敌人破坏而结束。

编者记

“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诞生于抗战初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从北到南，从银川古城到宁夏农村，长途跋涉1300余里，历时一年之久，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奔走呼号。他们不仅激励了宁夏广大青少年儿童的抗日救国热情，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抗战觉悟，而且先后输送30多名奋进青少年到革命圣地延安，直接参加了抗击日寇和中国人的解放斗争，有的同志在斗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8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决不能忘记宁夏“少战团”的光荣斗争业绩。在强敌入侵、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表现出的热爱祖国、同仇敌忾、胸怀大志、共赴国难、不怕艰苦、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据宁夏档案微信公众号）

宁马兵败如山倒 雄鸡一鸣始见天(下)

与此同时，石嘴山地区各县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一貫道、青红帮（哥老会）、瑶池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坚决予以取缔，人员重新登记后遣散。对社会危害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吸大烟、种大烟现象，坚决禁止，并颁布了禁止种大烟、吸大烟的布告，将烟馆全部查封。当时石嘴山地区以“一貫道”和“哥老会”两个组织最为庞大，据不完全统计，仅惠农县“一貫道”总人数就达1638人，“哥老会”总人数达1079人，“青帮”总人数785人，“红帮”总人数294人。

在废止了国民党马鸿逵旧政权的同时，为尽快建政安民，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共宁夏省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65军党委采用任命方式，任命了平罗、陶乐、惠农3县的县委和县政府领

导，要求各县根据需要和干部情况，以最快的速度设置县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并配备干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第19兵团抽调了一批部队干部转业到石嘴山各县工作，并在县委和县政府机关任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支援石嘴山建设的行政管理干部，同时，国家又从老解放区以及西北团校抽调了一批干部和学生前来自石嘴山参加工作，初步形成了石嘴山地方政权建设的骨干力量。

1949年9月26日至10月25日，在新中国成立后1个月内，平罗、惠农、陶乐县人民政府相继宣告成立。10月6日，中共惠农县委员会成立，信宁任县委书记；10月21日，中共平罗县委成立，马俊杰任书记；10月25日，中共陶乐县委成立，张文厚

立后4个月的工作，商讨了民主建政、生产救灾等工作。

在建立县级人民政权的同时，各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狠抓基层政权建设。首先是摧毁旧政权的保甲制度，将国民党旧政权的乡改为区，以行政自然村为村级政权单位，建立起村、区、县三级政权。区设区委和区政府，由县委和县政府派国家公员担任领导职务和一般工作人员，同时也吸收一部分农民积极分子参加。村干部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村、区两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人民群众理直气壮地当家作主，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

（据石嘴山市档案馆）

中共撒播革命种 昨日星火今燎原

演讲，对处于封闭落后的市境群众，起到了正面积极的引导作用。

冯玉祥将军在石嘴山镇（今石嘴山市惠农区）、平罗县驻留期间，曾召集当地官员和士绅开会，讲明国民军的任务“为解放民族，铲除帝国主义、军阀压迫而奋斗”，并宣布取消外国洋行的特权，废除免税条例等。冯玉祥在平罗县罢免了腐败谋私的县长王宾，视察了街市，走访了学校，并提出要把县城的一个高级小学办好，让所有青少年都能够入学读书。冯玉祥还专门召开工商界人士和平民百姓参加的集会，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说：“我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建立在民众意义上的。意义是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除军阀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使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放……”演讲之后，冯玉祥亲笔书写了“打倒贪官污吏”几个大字，命新任县长作一幅横幅，悬挂县城钟鼓楼之上，以示警戒。

国民联军总部驻宁夏城（今银川市）期间，政治部的中共党员开办了马列主义讲习班，创办油印小报《中山日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报道北伐战争进展情况，并在银川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宁夏特别支

部，平罗、石嘴山的一些进步学生和青年阎廷栋、叶松龄、雷启霖、刘堂琛等人参加了马列主义讲习班，首次听到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人关于马列主义的讲课，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27年5月，在银川“五中八师”（甘肃省立第五中学和省立第八师范合办，设立于宁夏府城）学习的石嘴山籍学生叶松龄，经李临铭（中共宁夏特支书记）、白虹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转正。他是市境最早的基本籍共产党员，也是宁夏当地首批共产党员之一。但当时在市境尚未建立中共地方组织。这一时期，石嘴山籍在外地工作、学习的进步人士也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理论和进步思想。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夏国民党当局驱除共产党员出境，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被迫解散。叶松龄由组织派遣化名为宁夏固知，回平罗继续开展活动。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负责人马云峰，由叶松龄、刘堂琛掩护也来到平罗，先后在宝丰、石嘴山小学以任教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1930年1月，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派刘志丹、谢子长、马云泽、张东皎、牛化东等6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队（冯玉祥部，驻平罗、姚伏）中，同正在该部的

中共党员高岗会合，搞兵运工作。陕北特委又陆续派40多人进入姚伏的十五团，成立学兵团，由张东皎任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并在学兵团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曹育华、李树林、薛应昌分别任组织、宣传、青年委员，有党员30余人。该特别支部由中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发生关系。由于部队调防，该支部在市境活动时间较短。是年，宁夏在北平（今北京）上学的学生30多人，在共产党员王绪祥（即张子华，宁夏中宁人）、孙殿才（即赵忠国，宁夏中宁人）的影响和组织下，发起成立“留平学生会”。平罗籍学生雷启霖、阎廷栋、高立天、谭尚彦等10多人参加了学生会，联络同学，宣传进步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学生会创办油印刊物《银光》（后改名《曙光》），宗旨是“根据团结精神，研究学识，唤起全宁睡民，改造阴恶环境，以扬文化，以臻文明”，撰写文章，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地方官僚和军阀的黑暗统治，将外地的革命情况、进步书刊等传递到平罗等地，在市境扩大了革命影响。同年冬，阎廷栋由孙殿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石嘴山市档案微信公众号）

将核辐射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的开路人(七)

——宁夏农林科学院核辐射研究应用专家归国华侨陈桂松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生活水平，都远不如我们。后来我的兄弟姐妹也多次从马来西亚到银川看我，他们都在讲，中国的发展真快，每次来都有变化。我一生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位好妻子，不论我是顺境还是逆境，她始终都支持我、鼓励我，为我解除后顾之忧，我每取得一项研究成果后都喜欢与她一起庆祝，分享成功的喜悦。家里遇到什么麻烦，她总是一个人全力克服，我工作忙起来她从不抱怨，遇到不开心时还总是鼓励我、安慰我，给我信心。我们结婚时，她单位的领导还劝她不要嫁给我，因为我的身份是华侨，当时的华侨地位很低，但她仍旧不听劝阻嫁给我，我想这就是“臭味相投”吧，她对我的工作很支持，我应该感谢一生。

核辐射技术应用好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但也有极高的风险，常年在核辐射环境中工作，陈桂松难免或多或少受到影响。陈桂松的体检报告结论显示细胞核丝断裂，原因是放射性实验造成的，通俗地讲就是人体免疫细胞受到损伤。但他不计较这些，坦言得了什么病就治什么病。

陈桂松：我是祖国培养的大学生，能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祖国建设中，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愿意埋头做事，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我对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更坚定的信心，上世纪90年代初，我重新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农科院很快就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农科院任命我为原子能应用研究室主任，给办公室挂上主任的牌子，我很不喜欢，找来一个信封套在牌子上，并告诉同事，别叫我主任，叫陈老师或者老陈都好。要说我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回到祖国，尽心尽力地报效祖国并获得国家对我的信任。改革开放后，我和妻子一起到马来西亚看看，父母都不在了，家里的兄弟姐妹告诉我，父母去世前最想见的人就是我这个远离身边几十年的儿子，可这个愿望最后落空了，这让我很难过。到马来西亚后我们发现，当地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社会发展，无论是人们的穿衣戴帽还是

（蔺银生 整理）

法学泰斗——吴家麟(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来到北平。有一位民主人士叫张志让，是吴家麟的恩师。他本来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在沈钧儒等人坐牢时，张志让为他们辩护。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君子”案。当年（1949年）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邀请张志让回来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后来，张志让应北大邀请到法律系兼课，给吴家麟所在的班级讲宪法课。张志让先生学贯中西，满腹经纶，雄辩滔滔，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当年吴家麟是宪法课代表，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想在课外成立宪法研究小组。在张志让先生的支持下，宪法学习小组搞起来了，而且办得红红火火。这是解放后北大学生成立的第一个宪法研究小组。自此以后，吴家麟立志要去做研究宪法。

北大毕业时，吴家麟被学校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当年研究生不是考的，而是分配的。他只念了2个月，因太缺老师就被调到法律系当老师，教国家法，也就是宪法。

到法律系后，吴家麟一边听苏联专家的课，一边给学生上课，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1954年，为了迎接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配合新宪法的宣传，吴家麟赶写了一本小册子《宪法基本知识讲话》，在新宪法正式颁布前由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共印刷了90万册。在报刊上吴家麟还写了一些宣传新宪法的文章。当年，全国高校第一次评职称，吴家麟被评为讲师，成为青年才俊。

刚走上讲台时，吴家麟是准备出国当外交官的人员上

宪法课。这些人的年龄比吴家麟的年龄大很多，但他们都很喜欢这位小老师，对他的评价也较高。后来吴家麟就给法律系的学生讲宪法课。有一位老学生对吴家麟上课时的特点概括为“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内容，严谨的逻辑，透彻的说理，洪亮的嗓音，生动的话语。”吴家麟授课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并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对学生的提问，他有问必答，每次答疑都努力做到一语中的，让学生满意。

1955年春，吴家麟给54级法律系学生上课时，相识、相知了一位对他无比敬佩而倾心的学生汤翠芳。后来这位学生成了他的妻子，二人相敬相爱、相伴一生，这是吴家麟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期间最大的收获并享用一生，也成为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尚存的精神支柱。晚年的吴家麟说：汤翠芳在事业上、生活上给了我很多帮助，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她我就活不到今天，就是活到了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经过二十多年的磨难，我还能这样锐气不减当年，我的老伴有一大半的功劳，她身上具有许多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汤翠芳祖籍福建龙岩，1933年生，中共党员。在汤翠芳幼年时其父就去印尼谋生。1938年，5岁的汤翠芳随母亲到印尼投奔父亲。二战结束后，印尼与荷兰发生混战，汤翠芳随家人返回国内，汤翠芳进入中学读书，因喜欢文艺、学习成绩好，在校期间还担任过班长。她的班主任老师不仅讲课得好，而且多才多艺。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有3位同学和他走得最近，受他的影响很大。汤翠芳便是其中之一。

（蔺银生 整理）